

20世纪中国 史学评论

王学典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 史学评论

王学典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王学典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3

(学者文存)

ISBN 7-209-02947-8

I. 2... II. 王... III. 史学—评论—中国—20 世纪—文集 IV. K09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006 号

学者文存

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王学典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9-02947-8

K·410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90年代以来,我对“20世纪中国史学”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史学的研究试图作若干努力。除有几册小书问世外,尚有一批文章分散在多家刊物上,学生想作参考,朋辈欲与交流,均不得其便。现应山东人民出版社袁晖兄之邀,结集其中一部分付印。为便于人们批评,这里对本书的编辑工作略作交待。

乘着所谓的“世纪末”这一“时间”带来的便利,也顺应苏东剧变等事件所提供的历史反思时机,“学术史”研究在90年代从最初三两个人的提倡,到后来竟蔚成整个学界的“热点”。这不能不说是90年代的一大学术事件。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看来有以下两个目的预设:通过这一研究来确定今天的学人们所应延续与继承的学统,也就是对“学术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不同治学路数门径的优劣异同,有所总结,以作今后的龟鉴,此其一。其二,作为整个历史反思的一个部分,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也是“书斋”里的学者这时介入现实的惟一可能的方式:通过这一方式,学者们事实上间接参与了“窗外”的论争,声音虽然纤细,效果可能并不见得无力。总之,无论是重续学统的冲动,还是“学术”之外的关怀,“学术史”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90年代的特定精神气候大势有关。换句话说,研究“学术史”的学术行为本身,实际上也内在地隐喻着某种非学术的企图。^①

^① 当年“学术史”、“学术规范”讨论的发起者之一汪晖最近直言不讳地说:“学术史、学术规范成为一时间的话题是隐含了某种政治性的”,有一种“微妙的政治思考隐含其中”。这微妙的政治思考”是什么,他也作了提示。见《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纪〉与〈学人〉》,《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我说上述这些,意在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并非在主观上认可这一事实):“学术史”从来不是“学术”一方单独写就的,而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共同执笔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认识似乎最为到位。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因此,“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出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以至于可以把他们写的历史看作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所以,他主张:在研究史学之前,应先研究史家,在研究史家之前,应先研究时代与社会环境。^① 如果这些看法没有大错,那末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史学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学术史的大关节、大转折时,社会学考察还应处于基础地位。这里事实上已牵扯到学术的“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唯物史观话语系统内部,将学术史的演化完全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派生的,固然有问题,但在“重估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思潮影响下,又将学术史的变迁完全视为主动的、自动的,将“学术”本身看作可以脱离社会与时代因素制约的“自足体”,也有着同样的或同等程度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划清学术史研究中的“外缘理路”与“内在理路”之间的边界与限度。在某种既定学术“典范”确立之后的常态时期,从纯知识的角度所作的内在考察当然是主要的;当新旧“典范”交替、学术方向转折的革命时期,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所作的外在考察则应当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说明学术为何向这个而不向那个方向转折),虽然内在考察这时也必不可少(学术无论向这个或那个方向转折,都是有着内在基础的)。

①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8、135、57、42、43、44 页。

在上述认识及笔者兴趣的驱使下,本书收录的相当一部分文章的基本思路,是努力将一些史学史上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关键问题作社会史的处理,在考察 1949 年后的史学思潮、史学现象时,更是如此。在社会学视野内,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她)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提出这些问题,绝非所谓的“现实关怀”使然,认为非如此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史学在 20 世纪所发生的变迁,是笔者的初衷。“正史”规范的式微,“新史学”的出现,“古史辨”派的崛起,“史语所”谱系的生成,“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奠定,特别是 50 年代“五朵金花”的盛开、80 年代和 90 年代学术风气的嬗替等,均非“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20 世纪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承平的世纪,而是一个从社会到经济、从政治到思想、从文化到学术均与“传统”发生巨大裂变的世纪,是一个各种“主义”与社会理念纷纷登场检验自己的魅力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历史大势面前,特别是在几度出现的“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民族、阶层和个体生存方式与生存机会的选择,老实说,始终处于积极的地位,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转型与发展,在更多的时间内,不能不具有从属的性质。所以,从“外缘理路”来思考与论说 20 世纪中国史学,至少是有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历史合理性的。

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研究与反思,构成本书的重点。我不回避我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偏爱”。不过,这种“偏爱”主要是基于下边这点自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铸造了一个‘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这种知识方向与知识范式理应受到时代的审查、反省与批

判,但至今并未过时。”^①但也不能不指出,近若干年来,我对这一史学流派的言说是经历了一个从“反思”到“辩护”的过程的。了解我的师友都知道,我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消极倾向的反省从来不假辞色,但必须承认,这仍然源于“偏爱”,因为不少朋友早就对它不理不睬了。——这一“冷战”情形到1995年前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正因为感受到这一点,我才在继续“反思”的同时,又开始了“辩护”的过程,而且此后的“反思”也注入了先前未有的“辩护”内容,甚至“反思”本身的锋芒也有所钝化。收入本书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与《“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两文,反映了我最近的“反思”与“辩护”所达到的“水准”。另外,也须指出,已有的“辩护”仅是发端而已。

收入本书的论文,大体分为四组。“典范”组: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化大势的整体扫描,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是“实证”与“诠释”两大“典范”此消彼长的冲突史,是我在近几年所一直坚持的基本预设。“思潮”组:反映了我对20世纪后50年特别是后20年中国史学进程的基本观察,其中,对若干史学思潮流变的清理,对若干史学趋向的把握,可能带有创始的意义。“动向”组:是对90年代以来史坛“热点”问题的跟踪评点,各文篇幅虽短,但所耗脑力不少,个别看法也堪称犀利;这组笔谈中的许多看法虽为其他长文汲取,但它们自身似乎仍有单独存在的价值,遂不避重复,保留下来。“人论”组:本着“在研究史学之前先研究史家”的原则,我想让“顾颉刚”篇反映新旧中国易代之际传统学人的精神状态,“童书业”篇反映50年代中后期知识者的心理恐惧,“翦伯赞”篇反映“文革”前夕一代革命学者的遭遇,“黎澍”篇反映“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倡导“思想解放”的“新启蒙派”学者所经历的思维苦难。本来,我还打算赶写出一篇题为《作为90年代主流思想文

^①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后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化符号的陈寅恪》的文章,补入书中,但由于付印在即,中途只好作罢。

将散在许多杂志上的文章汇成一书,所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注释体例的统一以及由此带来的校对任务。协助我做这一工作的是研究生蒋海升和林国华,此外,海升还帮我处理了与此有关的其他琐碎事务;特别值得提出的,本书中的《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和《“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三篇文章,是在博士研究生周国栋、研究生陈峰和蒋海升按照我的要求和提纲所做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乾嘉范式》一文在细节方面,有一些见解是周国栋的。李扬眉和王明芳也从不同方面支持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在此,谨向他(她)们致谢!

本书是在袁晖兄的一再督促下编选的;对文章的选拔与分类,他也多所赞划,甚至连本书的书名也为他所拟订。

最后,尚需说明的一点是:收入本书的多数论文,是我所承担的山东大学“青年基金项目”结题成果的组成部分。

目 录

前言·····	(1)
---------	-----

一、典范

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	
——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2)
两大学术谱系的对立与整合·····	(20)
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	(29)
“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	(59)
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	
变动·····	(85)
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	
——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一·····	(92)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	
——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二·····	(107)
从偏重方法到兼重材料	
——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三·····	(125)

二、思潮

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	
——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	(142)

“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	(157)
1958:当代史学方向转换的一大枢纽	(173)
新时期 10 年(1978~1988)的历史学评估	(202)
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	
——读《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的启示	(214)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229)
近 20 年间大陆史学的主要趋势	(251)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 50 年	(268)

三、动向

史学,“危机”何在?	(296)
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	(301)
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学的应有选择	(306)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312)
“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 一点思考	(315)
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	
——《两汉乡村社会史》简评	(319)
发掘乡村:21 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327)

四、人论

痛苦的人格分裂:从顾颉刚看 50 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	(336)
疯癫与社会:“肃反”中的童书业	(346)
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	(368)
80 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377)

一、典 范

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 百年史学

——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过渡、裂变中的中国;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也是一种过渡、裂变、转型中的学术。如同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艰难跋涉一样,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的转型也始终笼罩在与农业文明互为表里的经学的阴影之下。冯友兰把中国传统学术划分为两大时期:从孔子至汉初的淮南子为“子学时代”,从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近来有人则把康有为之后亦即 20 世纪的学术概括为“后经学时代”^②。我们感到这一概括既到位又准确。20 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时代,而是一个承受了大量经学遗产、经学因子的时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贯穿“经学时代”的始终,也潜在地制约着“后经学时代”的各个学术门类。在这个“后经学时代”的史学界,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大体上可以看作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漫长冲突的余响。史料考订派的实证追求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旨趣与“无征不信”的古文经学即汉学特别是乾嘉学派一脉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 1 篇第 2 章《泛论子学时代》、第 2 篇第 1 章《泛论经学时代》,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陈少明:《走向后经学时代》,载《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相承,史观派的阐释取向和经世情结与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亦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

百年中国史学史,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在这场世纪较量中,两大史学阵营中的学人谁都不拿正眼看对方,谁得势就压对方,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大体上说,史料考订派在1949年前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居于正统地位、主流地位,史观派则被边缘化。有人认为,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起至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①这种观察与感受当然有问题,因为“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不仅有疑古学派,还有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史语所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持各大学势力的更不仅是疑古学派。但如把上面引文中的“疑古学派”换成“史料考订派”,则这种观察和感受就异常准确了。史观派当时的确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他们的文章多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著作多出版在影响不大的书店,著名大学根本没有他们的讲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果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轻蔑。1945年出版的由史料考订派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编者自认为是一部从1840~1945年百年史学史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中,史观派几乎没有任何地位,除肯定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没有任何一位史观派学人和史观派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进入编者的视野,甚至有的章节直接把史观派学人看作是“宣传家”而非“学问家”,认为他们的研究除了“贡献混乱”外,没有其他贡献,显示出史料考订派的极端傲慢与自负。但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的到来,史学界也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异端变为正统,从“旁门左道”摇身成为主宰。史料考订派则被一步步地放逐到史学界的边缘,

^① 徐旭生(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7页。

到 1958 年的“史学革命”，他们多数又被当作白旗拔掉，史料考订派从整体上被打翻在地，名声也被搞臭，他们的治学路数和成果也被轻蔑地视为价值不大的“繁琐考据”，以致在被当作“繁琐考据”典型——考证洪秀全有无胡子——的例子中受到尽情的嘲弄与奚落。但史料考订派并未从此销声匿迹，在适宜的环境里仍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60 年代初，当史观派被“以论带史”的口号弄得颇丢面子时，史料考订派适时地发出了“论从史出”的呼声为自己的存在辩护；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史观派因“影射史学”而发生信誉危机时，史料考订派则进而倡导“回到乾嘉去”，表达出自己要重返中心的愿望；90 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全面变动，学术界重振“国学”的声浪日甚一日，调整学术谱系的呼吁不绝于耳，从 80 年代开始的对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特别是陈寅恪等史学大师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史学界人心的变动，史料考订派向中心的大步复归，标志着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大史学流派的冲突看来并不会随着 20 世纪的终结而终结。

“史观派与史科学派，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① 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都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们彼此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乃至大相径庭，最后就因这点理解不同而冰炭难容，势同水火。依据自然科学研究的程序，收集事实（材料），发现规律，这本是实证主义的完整纲领。可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实证主义这面旗帜却被一把扯成两半，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各自挑着半面旗帜互相攻讦。史料考订派认为“史学只是史料学”^②，用科学的方法亦即归纳演绎法，整理材料，确定事实，就使历史变成了科学。史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册（1928 年 10 月），此处引文据《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4 页。

料考订派的擎旗人胡适把这种“科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者简化为“拿证据来！”史语所的掌门人傅斯年则强调：照着材料出货，“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一句话，跟着材料走，“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事业^①。总之，史料考订派坚信，科学之为科学，本不取决于研究对象，大如天文地理，小如一虫一草，如能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都能成为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归纳演绎）研究历史材料，历史学当然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也是科学。与史料考订派对“科学”的理解相反，史观派坚信，一门学问是否科学取决于其研究对象是否客观、实在，取决于认识与对象是否完全符合。所以，他们指出：所谓科学，“不过就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历史既然是科学，那就“要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忠实的谨慎的是什么就还一个什么，丝毫不杂以主观的好恶和成见”^②。“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③至于对象中包含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容，历史学借此具有客观性，只是史观派心目中“科学”的一个次要特征。在这一派看来，历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它能从对象中发现“公理公例”、“物则天序”、“因果通则”、“普遍的理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并借此把历史井然有序地叙述出来。所以，史观派强调只要“理论（史观）”科学，历史研究就能科学。在史观派学人看来，没有理论，尤其是没有“科学的”理论，史料考订派提供的史料就是废物，就毫无意义。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既笼罩在它由以脱胎出来的经学的阴影之下，又被科学的阳光所普照。在经学失去了社会制度的依托而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册（1928 年 10 月），此处引文据《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1 页。

② 华岗：《中国历史翻案》，作家书屋 1946 年版，第 33 页。

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11 页。

急剧式微的时刻,科学的及时传入使原来寄依在经学怀抱中的史学找到了归宿,使 20 世纪初期反叛的新一代史家寻求到了稳定可靠的归属感。换句话说,科学的引进和传入填补了由于经学的突然撤出所造成的空白。所以,无论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人还是具有今文经学背景的人,在世纪初都急忙乃至有点狂热地扑向刚踏进国门的科学,实非偶然。科学取代了经学,但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却从“科学”那里接受了不同的洗礼。史料考订派所经受的洗礼集中表现在对经学家立场的比较彻底的清算。从经学家的立场转到学问家(科学家)的立场上来,是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的一个基本特征。所谓经学家的立场,就是不问是非只问家派,也就是钱大昕所强调的“治经断不敢驳经”;所谓学问家的立场,则是疑而后信、考而后信,只问真伪不问家派。从经师到史实,从经学家到科学家,史料考订派完成了这种角色转换。他们之所以接受了“科学方法”,前提是接受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这种“精神”和“态度”强调:一切主张,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① 这也就是顾颉刚在 1926 年所说的,在考辨古史时,“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② 心目中没有任何偶像,把一切学理都看作是待证的假设,这是对经学观念、经学立场的彻底涤荡,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拿证据来”,“只跟着证据走”。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原载《胡适文选》,此处引文据《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9 页。

② 《古史辨》第 1 册《自序》(1926 年 6 月),此处引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重印本,第 81 页。

“拿证据来”，“只跟着证据走”，史料考订派长于斯，但也短于斯，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归纳法）成就了他们，也局限了他们。读史料考订派大师们的那些考据文章，没有人不为他们渊博的学识、详备的引证、绵密的思路、丝丝入扣的推理、细针密缕的风格、尺幅千里的卓见和扎实严谨的结论所陶醉，令后生小子不敢奢谈学问。20世纪前期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国学研究，取得了前“不让乾嘉”、后不见来者的辉煌成就。但是，“拿证据来！”“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这种“科学方法”只能在“训诂学”和“版本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顶多在确定具体“史事”有无真伪的问题上施展其才干^①。问题的范围一大，就不是“拿证据来”所能应付得了的。如胡适在论先秦哲学时动不动就说“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一类的话。郭沫若就问他这个“黑暗”的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胡适始终避不作答，因为这是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证”不出来的，也不是任何证据本身所能给出的，“只跟着证据走”的胡适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面对这个问题，“照着材料出货”、对材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不够“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傅斯年也只好退避三舍。胡适的另一个高足、“古史辨”派的领袖、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顾颉刚，对此问题也是三缄其口。这是笃信“归纳、假设、求证”为“科学方法”的整个史料考订派所无法应付的问题。实证研究只能证实或证伪某些“名物训诂”中的问题和史事的搜求与确定等局部的或范围极其有限、边界十分清晰的问题，如杨贵妃脸型的宽窄及入宫前是否处女、明成祖的生母究竟是马后还是硕妃、顺治帝是否出家当和尚、李自成到底是死在湖北通山还是湖南夹山等，可以凭着“拿证据来”证实或证伪。问题一旦超出“史事”的范围，就不是实证方法所能解决而非得援用一定的学理来说明不可，这就进入了阐释的层次。且不说一些大型的问题如确定社会类型不是“拿证据来”所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